

89. 7. 15

● 质疑《鸦片战争》

● 批评《丰乳肥臀》

文学的蜕变

余开伟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 文化的最后挑战

● 向夏衍、王蒙挑战

● 直指张贤亮、刘心武的失误

● 审视《马桥词典》

● 评论《苏东坡》

● 对韩少功、莫言进言

● 莫言进言

● 向文学世俗化开火

文

余开伟著

学

的

蜕

变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文学的蜕变
——20 世纪文化的最后挑战

余开伟 著

责任编辑:留 声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插页:1

字数:170,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 ISBN 7—5404—1767—6

1·1412 定价:12.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芙蓉北路 564 号 邮编:410008)

我的批评观

(自序)

在当下重名轻实的世俗社会，像我这样游离于体制之外，不在传媒视线之内的文人，写作状况是十分困窘的。我虽然弱冠之年即开始尝试文艺评论写作，离开学校即踏上专业文艺工作岗位，人到中年又转到文学编辑行业，但是，由于命运多舛，历经坎坷，再加之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业绩平平，著作寥寥，从来就不曾进入过文坛的中心领域，一直是一个孤军奋战的文坛边缘人物，一个荷载彷徨的散兵游勇。这是我一生的文学定位，这是注定了的。我为此愧对缪斯，愧对时代，愧对师友，却又乐天安命，毫无怨尤。

《文学的蜕变》是我出版的第二本文学评论专集，主要收集的是近几年来针对九十年代文坛的种种现状所发表的文化批判文章，其中包括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所发表的文艺评论，有的篇章存在观点和论据互相重复的弊病，这是显而易见的。其实，这些年来我基本上不写作品评论，主要是专注于文学随笔和文化时评写作，我所关注的是当前在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化的冲击下，正在不断变异的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和五花八门的文艺思潮，力求对九十年代的文坛景观进行客观审视和冷静思考。

我认为，一个严肃的具有文化品格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和批评家，他必须面对历史说话，面对真理说话，保持主体性和理性立场。虽然，历史已被当今一些英雄好汉当做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魔方；真理已被当今一些弄潮儿当做胯下的坐骑任意驱遣，然而，历史和真理蒙尘和蒙羞的经历必将被时代记录下来，昭示后人警醒和深思。我坚信如此。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思维》一书中指出：“一旦脱离主体，违背理性原则，任何批判都不能成立。”这确乎是恰中鹄的的经验之谈。

记得先哲狄德罗说过：“真理和美德是两个密友。”我想，艺术的直系家族文艺批评亦应与上述两个密友结缘。我已出版的第一本评论集，即取名为《跪在真理和美德脚下》，盖缘于此。我觉得，对于严格意义的批评家来说，必须具有这样几点珍贵素质：不被俗见所囿的独立思考和敏锐胆识；超越功利主义的对人生真理和艺术真谛的执著追求；不计较个人得失，吐纳真言的铮铮风骨。随风趋时，媚俗欺世，违心奉迎，不会使批评家得到任何真正的荣誉，只能带来鄙视和耻辱。上述要求当然是很高的标准，却值得我们身体力行。我自知本身是凡夫俗子，资质平庸，只能在缪斯殿堂踟躅徘徊，很难登堂入室，但是，对上述标准虽自知不能至，却心实向往之，这也就聊以自慰了。

余开伟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二日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辑

千秋功过 自有历史评说	1
百年人物存公论	11
文人的蜕变	21
主持人的话	26
文学的蜕变	28
批评的蜕变	36
必须加大批评力度	41
策划与批评品格	46
批评的错位	50
批评的误区	54
市场批评家的表演	58
我们需要客观公正的“文化视点”	60

目 录

第二辑

王蒙是否“转向”	67
刘心武的批评观	75
名家与批评	79
被围困的清高	86
文学与道德的恩怨	93
无法回避的社会良知	99
伟人的卑微	104
关于社会生活方式的思考	109
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	113
与龙应台女士的对话	118
“湘军”到哪里去了	122
“湘军”为何难以重振雄风	125

目 录

第三辑

对发展西部诗歌运动的看法	133
新边塞诗面临的困窘	139
性爱和生存困惑的深刻观照	147
失落和迷茫	152
辛辣的悲剧	156
难孚众望的《丰乳肥臀》	159
历史小说创作的新尝试	164
历史小说的鼎足局面	168
电影创新的精品	172
独特的悲壮场面	175
怎样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178
病态的精神扭曲	186
默默耕耘的珍贵果实	188

目 录

雁声清亮	191
一位业绩卓著的出版家	193
《绿珍珠》的启示	197
《马桥词典》争论可以休矣	200

第四辑

沉重的忧思	205
试谈图书出版的一个重要问题	209
一部开拓性的优秀学术著作	214
文化烈士 风范长存	217
早得声名年方少	222
《赵丹西域蒙难记》创作手记	225
《跪在真理和美德的脚下》前记	228
《哲人的浪漫》创作谈	230
扼住命运的咽喉	232
别情依依恋天山	236

第一輯

千秋功过 自有历史评说

——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的感想

最近，怀着对文艺前辈虔诚的敬仰心情，认真拜读了夏衍同志在《文学评论》今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掩卷沉思，心情却很不平静。既因从中了解到一些三十年代“左联”时期文艺战线的史实而感到深受教益；又因文中涉及到另一位文艺前辈冯雪峰同志和文学导师鲁迅先生的某些不公之处而感到深深遗憾。

夏衍同志这篇长文，主要是针对冯雪峰同志生前所写的《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见《新文学史料》第二辑）这篇材料而写的，作者开篇即声称他接受一位老朋友的建议，担心“再过些年，文化革命前后某些人凭空捏造、牵强附会，以及用严刑逼供制造出来的诬陷不实之词，就将成为‘史实’。这是对不起后人的事情”，所以感觉“有必要把一些尚未澄清的问题说

注：此文发表后，得到夏衍同志的宽容和理解，夏衍老接受了我的意见，将他的《一些应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从即将付印的文集《懒寻旧梦录》中抽下。夏公此举，令我感佩，拙集中《名家与批评》一文也为之赞叹。

明一下真象”云云，可见它并非“信笔拈来”的即兴篇章，而是殷忧所在的有感之作，其良苦的用心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无可訾议的。

冯雪峰同志所写的那篇材料，详细说明了三十年代“左联”时期鲁迅先生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前后的具体情况，其中谈到了鲁迅先生当年对周扬、夏衍等同志的不满。林彪、“四人帮”一伙曾经利用这类材料作为政治筹码，对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同志进行残酷迫害，使上述几位文艺前辈及有关同志惨遭荼毒，田汉同志竟至含冤九泉。触景伤情，痛定思痛，夏衍同志对这篇材料怀着特殊的反感，这是完全可以体谅的。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上述滔天罪行，千夫所指，人所共愤，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对于冯雪峰同志这篇材料写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作了修改”这一点，夏衍同志却强调说：“注意到这两个日子，我觉得冯当时那样写，把许多罪状堆在周扬同志和我身上，也有可以原谅的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下，迫于逼供信者的压力或者受到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而写一些过头话，也是常有的事情。”这段话实际上给予人们一个强烈的印象，这就是夏衍同志认为冯雪峰同志是屈服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淫威不得不说一些“假话”，所以不足为凭，不足深信，这就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材料的史料价值，而且有意或无意地对冯雪峰同志脸上涂上了一点污水，我认为这是极不公平的。

应该看到，林彪、“四人帮”一伙企图利用逼供信等法西斯手段迫使冯雪峰同志提供有利于他们一伙政治阴谋的材料是一回事，冯雪峰是否屈服于这种反动淫威说了假话又是另一回事，根本不能凭空地把两者混为一谈。林彪、“四人帮”一伙企图利

用这个材料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并非冯雪峰同志的过错，这笔账应该算在林彪、“四人帮”这伙丑类身上，决不当让冯雪峰同志承担任何责任，更不能因此作为怀疑或否定冯雪峰同志这篇材料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的依据。我们研究和评价事物，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以确凿的事实作为立论的根据，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为分析事物的前提，其中不能夹杂个人偏见，更不能包含主观的臆断，否则事物的真象就有可能走样，不但不能达到钩沉刊谬、剔误扶正的目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冯的那篇材料就可以感觉到，冯雪峰同志的写作态度是比较慎重和严谨的，他大体做到了比较严肃、客观地介绍事实真相，没有推诿自己当时的过错，一再说明自己“当时是有严重错误的”，“我也是有责任的”，并未渗入个人的私怨，文过饰非地把“许多罪状堆在周扬同志和我（指夏衍——引者）身上”，更没有“迫于逼供信者的压力”，表现得屈膝妥协，向林彪、“四人帮”一伙低首就范。同时考察，这篇材料所谈的事实虽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但大体上却与现代文学史材料上所公认的一些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这，我们从鲁迅先生当时的一些文章和信件中就可以找到佐证。

诚然，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雪峰同志思想认识上的某种局限，他这篇材料中确实存在不恰当的地方，例如他把周扬、夏衍等同志所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被毛泽东同志肯定为“是革命”的口号，看作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这显然是不对的，应予纠正的。不过，在这篇材料的末尾，他曾经郑重地声明：“但在一九三六年时，我没有发现周扬、夏衍等人同王明有什么组织的联系，现在也想不起可供追查的线索。”可见雪峰同志是尊重客观事实的，并未在压力下制造什么“诬陷不实

之词”。其实，林彪、“四人帮”一伙蓄意加害周扬、夏衍等同志，决非雪峰同志这份材料所致，而是这伙十恶不赦的野心家、阴谋家早已预定的毒谋。“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即使冯不写这个材料，周扬、夏衍等同志也决不能逃脱劫难，这大概是很明显的事吧。即便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这个材料大造舆论，给周扬、夏衍等同志罗织罪状，使他们大吃苦头，是否就能证明这份材料不好，值得怀疑和否定呢？我觉得是不能这样轻率地作出结论的。夏衍同志不这样正面提出问题，却从冯的这份材料写作日期的历史背景上来做文章，就学术探讨角度而言，自然也可以当做“一家之见”，“立此存照”，未尝不可；但从严格的治史态度来看，毕竟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缺乏确凿的证据，是很难使人信服的。

夏衍同志一方面对冯雪峰同志提出上述凭空设想的质疑，一方面还用大量的笔墨对雪峰同志在“左联”时期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尖锐的指责。认为“他心理上带着一种‘长征干部’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有一个中央特派员名义”，“他早就对阳翰笙、周扬等当时文委的成员不满意，甚至有宗派、行帮情绪”，“千方百计地要把周扬调开上海”，“至于偏见和固执，那就从很小的地方、从他的文风也可以看得出来”，“还加上一种新出现的骄傲情绪，一言堂得厉害”，“文艺批评界，在他心目中也是一个也看不上眼的，大概后来就看上了一个胡风吧”；同时还指控“他们在这段时期，究竟散布过多少谣言，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如此等等，贬词连篇，不一而足，其情绪之激烈，罪名之严重，都是令人瞠目震惊，大有算清旧账，决不宽容的味道。笔者乃无名小辈，过去既不认识、也没有接触过冯雪峰同志，只是拜读过他生前的一些精彩的文章和作品，对他的为

人品格谈不出什么直观的印象。然而，从雪峰同志与鲁迅先生之间崇高的战斗友谊中，从他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一片赤诚中，从他对无产阶级文艺呕心沥血、忍辱负重的生活实践中，我们所看到的冯雪峰同志是一位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朴质谦逊的共产主义战士和革命家的可敬形象，而决不是如夏衍同志所涂抹的那副“白衣秀士王伦”式的可憎面目。尽管冯雪峰同志在三十年代以及后来的工作中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对左翼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还是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冯雪峰同志平反追悼大会上所作的悼词，对他一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是众所周知的。不仅如此，我们从曾经得其教益的著名作家杜鹏程、韦君宜、菡子等同志那些充满感激之情的纪念文章中，更得到了深刻的感受。

诚如菡子同志在《山花烂漫时——敬悼雪峰同志》一文（见去年十一、十二期合刊《文艺报》）中所说的：“他始终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坎坷不平的斗争道路上，不能没有这样一个坚韧不拔的先行者”；“他一生保持可贵的清贫，在上饶集中营更是坚贞不屈，作家中他是参加长征的有数几个人中之一，而且在长征时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但他从不言说，以至很少人知道他参加长征”；“他鄙视炫耀，朴素是他突出的气质”；“党也离不开这样忠诚的战士。历史是公正的啊！”的确，历史是公正的！不公正的“历史”，是不可能借助权力的淫威永远站住脚根的，人民迟早会把它抛置九霄云外。对于一位对党、对革命竭尽忠心的老战士，对于一位一生坎坷曲折、含冤屈死的文艺前辈，夏衍同志如此求全责备，百般指责，这在道义上才真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夏衍同志的文章不但对冯雪峰同志写了上述材料提出责

难，而且还因为鲁迅先生写了论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而愤愤然，特别是针对该文中提到“四条汉子”部分，颇有微词。对鲁迅先生也提出了非议，以嘲讽的口吻说当时他和周扬、田汉等四人找鲁迅先生，这是“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既不是觐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自觉地‘轩昂’了一点，也不至于犯了什么不敬罪吧。读过鲁迅一些文章的人都会知道，鲁迅写到他不满意的人的时候，常常会信笔写来，加以艺术夸张”，进而引伸鲁迅先生上述文章“夹杂着一些不正确或者错误的东西，那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作为文艺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的夏衍同志，对于鲁迅先生三十年代对于他们的某些批评这样耿耿于怀，心存怨气，这是令人惊异，期期然以为不可的。

当然，鲁迅先生虽是一位伟人，空前的民族英雄，但他毕竟同样是人，不是神，他也会有缺点和局限性，对人对事，也会产生失误或差错。对于领袖和伟人，我们并不主张“为贤者讳”，对其缺点和错误一概掩饰，而是主张实事求是，信而不“迷”。在三十年代国统区敌情严重、矛盾复杂的特殊环境中，鲁迅先生四面受敌，艰苦奋战，对人对事不可能不发生某些差错，对此进行客观的分析也是容许的，必要的。只是凡事总得秉公而论，不能意气用事，对鲁迅先生这样的历史人物尤应持严肃、慎重的态度，片面和偏激是不足为训的。就事论事来看，鲁迅先生上述这篇著名文章虽然议及了周扬和夏衍等同志，统称为“四条汉子”，“态度轩昂”，在某些问题上有所批评，同时，鲁迅先生文中还殷殷期望地指出：“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足见鲁迅先生